

京都與東京

將京都和東京並列，是一個有趣的比較——什麼樣的歷史時代背景，鑄造什麼樣的宮城，風水一直參與其中，這點日本有關學者亦予以認同。然而隨著現實需要，內涵亦有所調整和轉化，說明風水並非一成不變。

先旨聲明，日本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首都的具體位置，只習慣以天皇居處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首都一詞只是一個從俗的說法。

京都和東京作為日本歷史上兩個重要的首都，其宮城選址和佈局的差異反映了日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日本在定都京都（古稱平安京，794-1868年）以至奈良（古稱平城京，710-784年）之前，經歷了繩紋時代、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農耕社會。後來社會發展到關鍵階段，在自身欠缺深厚文化基礎之前，需要主動地、有選擇性地引進其他較為發達的文化（如中國唐朝）作為最重要的國家資源，加強本身的文明進程和國家建設。

京都位於日本本州中部，地理位置相對內陸，四周環山，具有天然防禦優勢，與中國宮城強調內向封閉的標準相似；中國自夏朝開始，歷代宮城都選址在內陸地方，並且有群山遮掩（僅北宋開封例外）。京都在都城設計上更幾與隋唐長安城同出一轍，宮城在北，民居在南，採用棋盤式街道規劃，強調對稱和秩序，卻做得比長安更徹底。長安的東市西市由拂曉開到黃昏，規模龐大，居民可以交易買賣，滿足生活所需，西市甚至是與西域經商的集散地；京都雖也有東市西市，然而規模小，開市時間短，貨品亦不多，城

市功能完全以宮廷為中心，重點在於皇權的表述，側重政治遠多於經濟。「居住在城市中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貴族、政府官吏和各類僕役，幾乎沒有真正的城市居民」⁰¹。

至於東京，古稱江戶，雖然保留了風水思維，例如皇居採取江戶城的背山面水格局，四神亦有呼應，但已非京都傳統面目，反而多見「和洋折衷」，對外來事物博取眾長，進行選擇性吸收和再創造。有別於京都僻處內陸，東京位於關東平原，靠近海岸，地理位置優越，利於與國內外進行貿易和交流；佈局上亦擺脫矩形模式，變得靈活自由，接近現代化城市規劃，宮城（江戶城，現為皇居）位於市中心，周圍是放射狀的道路系統，不再是棋盤網格，突出皇權再非唯一考量，城市規劃更注重實用性和經濟發展，反映了近代日本對外開放的需求。東京既是政治中心，同時滲入更多都市文化，出現龐大的市民階級，所以描寫都市百態的浮世繪才得以問世。

要言之，京都的選址和佈局，體現了日本在古代大幅吸收中國文化，嚴格遵守其中法則，只作出了輕微的調整；而東京作為現代首都，則體現了明治維新後日本追求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戰略意圖，不再以中國為唯一模仿對象，而是逐漸西化，形成兩者存在頗為明顯的差別。

「我們也不能忽視日本東西地區不同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不同區域文化……日本的西部（即今關西地區以及往西的四國、九州一帶）和東北部（即今關東以及東北地區）都呈現出差異較大的文化特徵」⁰²。

01 徐靜波：《解讀日本——古往今來的文明流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144。

02 同上，頁12。

◎ 與中國的淵源

已故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說：「我要談一談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的問題。中國文明起步在前，日本深受影響，這是無可懷疑的。日本接觸中國文化，包括文字、儒家經典、佛法等……無論如何，隋、唐以後日本開始了一系列全面吸收中國文明的活動，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⁰³。

余英時還引述另一位學者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稱，中國「古代文明」上起於商周，下終於漢代；「遠東文明」繼起於6世紀，即中國的隋唐時期，分為兩支，一支是本幹，在中國；一支是分支，在日本。中國文化比蘭學（荷蘭文化）早了超過八百年傳入日本，兩者最大的不同，是中學側重概念，蘭學則集中在實用方面，包括醫學、物理學、電學等。

關於中日最早的淵源，不得不提徐福傳說。根據《史記》，秦朝時，傳說東海有三神山，名為蓬萊、方丈、瀛州，上有仙人居住，秦始皇派遣徐福及數千童男童女東渡，入海求仙人。目前在日本各地，亦有許多聲稱是徐福登陸的遺蹟和故事流傳，例如和歌山有徐福公園，本州最北端的小泊村為徐福造像，甚至有日本人認為徐福是神武天皇。專研日本史的上海復旦大學徐靜波教授稱：「想來此事絕非空穴來風。比較合理的解釋，我想是限於當時的航海條件，徐福的船隊不一定自始至終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很可能會將船隊打得飄零四散，未遭海浪傾覆的船隻有可能各自在可遇見的島嶼和陸地紛紛登陸，因他們的

03 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328。

首領是徐福，於是各自都稱徐福或徐福一行，或乾脆自稱秦人，因此今天的日本才會有那麼多的徐福登陸遺跡和相傳傳說」⁰⁴。至於徐福此行，仙人求不到，卻為日本帶來了中華的稻作文明和工藝技術。在此之前，日本經歷了一萬年以上漫長的繩紋時代，到彌生時代（前300-公元300年）突然急速發展，被部分學者聯想為「徐福帶來文明」。

到唐代，中國國力大盛，周邊國家紛紛入貢，風水也隨著兩國頻繁的交往傳入日本，為統治者所用，納入陰陽道體系，由陰陽寮掌管。陰陽寮統攬天文地理、農時曆法及占卜等知識，負責觀測星象、驅邪祈福和預測吉凶，為統治者提供意見，首長稱為陰陽頭，次官為陰陽助。陰陽寮在天文曆法方面的職掌，類似唐代的太史局或明代的欽天監，但增添了方術色彩。平安時代，宇多天皇在位期間，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輯錄在日的中國道教經典，當中可見《青烏子》、《玄女經》等中國風水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風水一詞在日本並不普及，經過本地化發展，一般稱之為「家相」。從字面意義，所謂相，當動詞用，即省視、勘察之意，等同於面相和手相，通過表相表象來判斷吉凶關係，分別在於後者以個人為單位，前者則是一家一宅。根據表相好壞，給予不同評價，相信有諸內而形諸外，換句話說，諸物表相是內在本相的提示，藉此掌握真實狀況，了解一地吉凶，選宅擇屋。到江戶時期，有松浦東鷄所著的《家相大全》、松浦琴鶴的《家相秘傳集》等書面世。

04 同註1，頁23。

不過，以上說法只適用於陽宅。在中國，傳統上風水對陽宅（皇帝是宮城，平民是民居）和陰宅（皇室是皇陵，平民是墳場）一視同仁，但在日本，對陰宅的重視遠不如陽宅。雖然有一段時期日本統治者熱衷營建大型墳墓，甚至因此得名古墳時代，但都與風水無關。日本也有皇室陵寢區，例如東京八王子市長房町的武藏陵墓地，埋藏著大正及昭和天皇夫婦；仍在世的明仁上皇夫婦也預定身後歸葬於此。然而若論皇陵的數量規模，基於兩地文化差異，根本無從比較。中國人強調「慎終追遠」，而且相信陵墓風水可以福澤後人，因此對陰宅的經營不下於陽宅；日本的主流喪葬文化由佛教思想主導，更重視「靈魂超度」而非肉體安葬，視死亡為一個終結，墓地更多是紀念場所而非風水載體。而且相較於中國，日本國土狹小，尤其城市地區環境擠逼，土葬空間有限，風水更無用武之地。所以本章談京都和東京風水，只限於皇城部分，不涉皇陵。

◎ 不同的「陰陽」

儘管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自鑄了許多新詞，名為「和製漢語」，諸如人權、哲學、演說等，不勝枚舉，然而「陰陽」二字卻是百分百的中國產物。早在周朝先祖公劉時代，已有「既景乃崗，相其陰陽」之說，意為公劉以日影定位，登上山崗，觀察陰陽，選擇宜居之所。陰陽也是先秦《易經》的核心哲學框架，強調「平衡」與「自然法則」；到晉代郭璞《葬書》也有「來積止聚，沖陽和陰」的記載；唐代陰陽論達至鼎盛，滲透至醫學和風水（如《黃帝內經》和《黃帝宅經》）、天文和占卜等領域。然而風水隨遣唐使傳入日本後，淡化了陰陽的哲學概念，只截取其具象化、可操作的部分，進而將其官僚化，成為政府機構職能，更側重於占卜曆法的實用性，為皇室服務；到近代更變身為一種奇幻美學，在小說和動漫中延續它的神秘色彩。陰陽落在日本人手裡，轉換成不同面目，這是風水在不同地方在地化、本地化的另一種變奏。

◎ 始於平安，終於平安

定都京都，稱為平安時代，有學者指出，平安時代是日本文明史一個重大轉折期，「簡單地說，就是它的文化從中國影響佔壓倒性優勢的『唐風時代』，轉到了本土文化崛起的『國風時代』」⁰⁵。這種轉變，與兩地各自的歷史發展有關，「從平安時代的中期也就是10世紀前後開始，遣唐使的派遣早已停止，大唐也已經滅亡，趙宋王朝建立以後，雖然文化上相當燦爛，但它的國勢和疆域已不能與大唐同日而語，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也有很大的萎縮。在此期間，日本在慢慢咀嚼消化大陸文化的同時，早先土著文明的元素開始發酵、滋長，藉助外來先進文化的形式或內涵，產生了日本本民族的獨特文化」⁰⁶。

這段引言，說明了為什麼京都與江戶（東京）在選址和佈局上大異其趣。

05 同註1，頁71。
06 同上。

京都

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稱：「在移民及日本遠遊者的共同努力，日本輸進了以中國象形文字為基礎的書寫系統，另包括各種政治及宗教上之思想與制度。在奈良及平安時期（8世紀-12世紀），日本古代文明能開花結果，實奠基於此」⁰¹。

中、日、美的學者一致認同，日本直接受到唐朝文化的影響，京都不論在選址和佈局上都恍如長安城的翻版，凝聚了當時的中國文化、空間規劃智慧和建築技術。時隔千多年後，當唐朝早已湮沒在歷史洪流之中，我們竟然可以禮失求諸野，在京都上演一齣「尋唐記」。儘管隨著時代發展，不可能完全保留昔日原貌，但今天市內還豎立著「大極殿遺址」（圖一）和「羅城門遺址」（圖二）的石碑。從北端到南端，將兩者拉成一條直線，正是古時貫穿宮城的中軸線——朱雀大



● 圖一、圖二：「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大極殿(上)及羅城門(右)遺址都是昔日盛極一時的平安京寫照，繁華落盡，藏身於尋常人家之中。

01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



街，然後比照平安京的規模，知道哪裡是白虎青龍、朱雀玄武，就會明白為何當年選址京都，並且一佇立就是一千年。

當然，說京都完全是唐朝的翻版，也不盡準確，現時我們看到的標誌性建築例如金閣寺、銀閣寺，還有傳統文化如茶道、花道等，其實都在平安時代之後形成，有著地道「日本風」，而非純粹的「唐風」。到踏入江戶時期，日本更搖身一變，按自身國家需要，只保留部分中國文化，完成完整蛻變，這點在東京一章再談。

有一點不可不知，第一個模仿長安城的日本都城並非平安京，而是位於今奈良的平城京，後來短暫過渡至長岡京（今京都西南）十年，才將京城佈局遷到平安京，情況一如明初南京紫禁城遷往北京。從

選址和佈局上，平城京和平安京頗多一脈相承之處，可以互相參考印證，一些平城京的缺失，直接導致平安京的誕生。因此，要了解京都平安京的風水，宜先從平城京開始。

個人經歷

你到京都的原因是什麼？

鴨川乘涼，上清水寺俯瞰市貌，祇園看藝伎cosplay，還是到京都的廚房錦市場覓食？筆者過去到京都，都是抱著遊客心態，吃喝玩樂，沒什麼大作為，直至最近一次，衝著本書而來，所以對這裡的地貌和佈局格外用心。例如留意到鴨川為什麼在城市東面；在清水寺不僅向下俯瞰，而是平視山巒環抱，明白什麼是大局觀；又特別到京都御苑走了一趟，看它的佈置和建築形制；其中最大發現，是朱雀大

道（今千本通）盡頭羅城門兩旁的東寺和西寺，同時代興建，竟然命運各異，一榮一枯。東寺在城門東側，呼應五行中的木，今日看來，東寺猶如活著的建築遺產，依然保養完好，入秋時候更是賞紅葉的熱門景點，人流如鯽；反觀西寺，早已片瓦不存，僅在小山坡上保留著一塊寫著「史蹟西寺趾」的石匾，四野荒涼，人跡罕至，和東寺相比，顏唐得令人唏噓。明明都是舊日平安京見證，也經擅於保存古物的日本人之手，何以景況判若雲泥，左右嚴重失衡？筆者心中暗忖，莫非真的是五行發揮本色力量？東寺在城門東側，東方屬木，主生氣成長，意象上枝葉繁茂，生生不息，所以至今尚存？西寺所在的西方屬金，主剛銳革新，清肅殺伐，莫非就注定命運凋零，難逃清空？

孤例不立，當年的平安京分為兩側，東側（左京）稱為洛陽，西側（右京）稱為長安，竟然都是左京較右京興旺，人口眾多，商業發達，以至將「洛」化身平安京的代稱。箇中詳情，將在下文一一交代。

『大局觀』

二百萬年前的京都，還是一片湖泊，後來泥土沉積，形成盆地，從繩紋至彌生時代，京都一帶已形成原始聚落；從古墳到奈良時代，渡來氏族（即朝鮮半島及大陸移民）勢力壯大，農耕水利得到開發。公元784年，桓武天皇有鑑於平城京水運不便，加上為了擺脫奈良的佛教勢力干涉，強化皇權統治，於是遷都至今京都西南的長岡京，但長岡京短短十年間發生大量天災人禍，怨靈作祟之說甚囂塵上，因此到公元794年又決定遷往平安京，自此開展了京都作為「千年之都」的歷史，直至1868年明治天皇再遷都東京為止。

日本從孝德天皇（645-654年）開始追隨中國制度，例如首次採用年號，史稱「大化改新」，此後積極吸收唐朝文化，在8至9世紀達到巔峰。韓國籍尹宏基博士對京都的選址作出高度評價，稱「在我看來，京都盆地幾乎是教科書式的吉祥之地」⁰²，並引述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一書，指就著宮城的選址及興建，「朝廷諮詢了風水師（編按：即陰陽師）及大臣和氣清麻呂，確保京都的選址符合吉祥之地的要求」⁰³。

了解京都地形，大概明白桓武天皇選址京都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水無山則氣散而不附，山無水則氣塞而不理」（《管氏地理指蒙》），依山傍水一般視為風水寶地的基本條件，中國的八大古都，地理大局上俱挾鉅勢強形（北宋兩都稍遜），山重水複，山環水繞。那麼日本的京都又如何？北面有貴船山、鞍馬山，東面有比叡山、大文字山，西面有愛宕山、嵐山，三面環山，南面開闊平坦，通往大阪和奈良，整體上北高南低，左右互蔽；而且擁有豐富的水系，東北面有日本最大淡水湖——滋賀縣的琵琶湖，北面有賀茂川及高野川呈Y字形合流，形成東面的鴨川貫穿市中心，西面的桂川則流經嵐山及渡月橋等地，因之京都也是一個山水大局，與中國國都的選址要求不謀而合。一個地方有山有水十分重要，若然合局更佳。《中國風水文化》指出，《周易·說卦》中的「山澤（水）通氣」作用巨大，「一是山澤之地是戰略防禦要地，安全性能好；二是山澤之地動植物資源豐富，土壤肥沃，可以滿足在生產力條件低下的小農經濟，三是所謂『風水寶地』無不處在山澤之間，這裡物豐氣通」⁰⁴。

02 Hong-Key Yoon: *Vj g"Ewnwtg"qh'Hgpi Uj wk'kp"Mqtgc- Cp"Gzr mqt cvkqp"qh"Gcuv"Cukc.p" I gqo cpef*, Lexington Books, 2006, P226.
03 同上。
04 顏廷真、孫魯健：《中國風水文化》，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32。

遣唐使角色的轉變

京都的選址佈局與風水呼應如此緊密，我們不妨對照當時的中日交流史，其中遣唐使是一道重要橋樑，肩負將中國文化帶返日本的關鍵角色。準確一點說，遣唐使這名稱僅為日本所用，中國稱之為朝貢使。

早在隋朝，日本已經派遣遣隋使到中國學習，著名的包括小野妹子，攜帶的國書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起頭，是迄今所見最早使用「天皇」稱號的記載。

一般說法稱，日本仰慕唐朝文化，於是派遣使者到唐朝學法，是為一個官方使節團，成員包括正使、副使等外交官員，留學生與學問僧、工匠及醫師，以及翻譯與隨從等，統稱為遣唐使，由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開始至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為時約260餘年，將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以至科技與生活方式帶回日本，令全國上下刮起一陣陣唐風，影響深遠。日本遷都平安京的794年，唐朝正值德宗治世，國力從高峰步入調整時期。在此之前的百多年，唐朝文治武功鼎盛，吸引四方來朝。王維詩曰：「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亟言萬邦來朝之盛，場面宏偉莊嚴。

不過，有一點必須強調，其實最初遣唐使出國的目的，意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特別是白村江海戰（663年）之後，兩國關係緊張，日本為避免唐朝出兵攻伐，主動來使修好。到整個遣唐使的歷史進入中段，其時武周結束，大唐恢復穩定，才以學習中國文化為主要目的。這點從隨行的名單得到證實，首幾趟人數僅百餘人，外交官員以外，佔一半是船夫和僕役，後來才擴展到五、六百人，多了一些留學生和留學僧等，著名的阿倍仲麻呂和空海和尚便是其中之一。

遣唐使真正成行共16次，大約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第二階段在唐太宗和高宗時期，人數船數都較少，主要走北路，跟隨新羅的使者一起到唐朝；第三階段才是高峰時期，「規模擴大，每次船數人數都相當多，而且遣唐使，如留學生、學問僧等人，在唐朝逗留學習時間都相當長，他們回日本以後，帶去了很多的典籍、技術，對日本的影響也最大。第四階段，遣唐使規模依然龐大，但他們向唐朝學習的熱情，不再如武周、玄宗時期那麼強了」⁰⁵。

我們要知道，當時派遣遣唐使出外是一件舉國大事，極度耗費國家資源。資深中國新聞工作者，也是日本新聞網創始人徐靜波，在其著作《靜觀日本》中提到，「為了組織一次到中國的遣唐使活動，日本需要用三年的時間來籌備財力，因為要打造四艘在當時稱得上是『超級』的遣唐船，和籌劃一支船員隊伍，需要花費一大筆國庫資金」⁰⁶。

作者還透露，當時要打造一艘長33.6米，寬9.2米，以當時日本的技術水平，要把木板與木板滴水不漏地拼合起來，更要經得風高浪急的東海，真的一點不容易。每艘船上有船工130人，加上外交官員、留學生和留學僧等，共有約150人；以每次四艘船，即六百人出行，但最終只有一艘船成功抵達中國計算，其餘四百多人，部分僥幸的能返回日本，但更多人死於海上。因為當時由日本前往唐朝中土，航行風險極高，海難頻繁，導致損失慘重。

05 葉煒：《中國古代史十四講》，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頁226。
06 徐靜波：《靜觀日本》，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頁105。